

大循环：“十五五”高质量发展(上)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技术进步加速迭代的复杂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就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如何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深化改革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进而通过国内国际循环协同共振实现发展范式转型升级，是攸关我国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在2025年9月与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联合举办“‘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制度型开放与畅通内循环”圆桌会议的基础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做强国内大循环与制度型开放的改革路径、政策创新、联动机制等展开深度对话，分“大循环”和“制度型开放”两期专题刊发，希冀从理论维度助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普惠包容、互利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秩序的构建。

刘世锦研究员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识别、培育并利用好三类增长优势——追赶潜能优势、新技术革命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构建以“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为核心的“基础三角结构”。刘元春教授认为，“十五五”时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把握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带动“质”与“量”的跃升，以及宏观经济周期再平衡两条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提出“十五五”时期速度、质量与温度协同发展的路径。陈道富研究员探讨了“十五五”时期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五个维度：一是国内大市场的统一；二是生产与消费的平衡；三是储蓄与投资的有效转换；四是在代际传承和代际公平中实现代际循环；五是技术跃迁下新旧动能的转换。乔依德研究员认为，推动和做强国内大循环要重点处理好四对关系：消费与投资的关系；高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企业出海与就地深耕的关系；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高帆教授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理论根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理论；实践层面需筑牢四大支柱——需求扩展、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和对接畅通。王宁教授指出，当前我国生产与消费内循环面临“互倚性困境”，其深层社会基础在于“私域社会发达、公域社会孱弱”的结构，破解困境需要借助数字化与代际更替推动社会基础重构，达成新型合作治理。

——主持人 李梅

“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优势与重要战略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于 2010 年第一季度达到阶段性高点，逐步转入中速增长。与此相对应，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由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正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超过 1 万美元，尚未跨过高收入国家人均 GNI 的门槛，并可能在这个门槛前徘徊数年。历史经验显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发展转型阶段。从增长动能角度看，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投资和出口驱动为主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为主的艰巨挑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齐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识别、培育并利用好新格局下的增长优势尤为重要。

（一）追赶潜能优势

所谓追赶潜能，就是发达经济体已验证可行、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具体地说，现阶段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 1.4 万美元左右，而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约是 3.5 万至 4 万美元，至少还有 2 万美元的增长空间，核心增长点包括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传统制造业和农业的转型升级等。与追赶潜能对应的需求比较稳定，供给侧技术相对成熟，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确定性较强，在目前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发展环境中尤为重

要。相应地，实现这部分增长潜能的学习成本较低，需要保持后来者谦虚谨慎的心态，愿意学习、善于学习，争取以更低成本、更短周期实现质与量的同步跃升。

（二）新技术革命优势

以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为重点的新技



术革命对中国而言是重大战略机遇。在工业革命以来的历次人类技术革命中，中国是跟跑者，而且与领跑者差距很大，处于一种“难以望其项背”的状态。而这一次有了显著的不同，尽管中国在科学发现、原创技术层面仍然有差距，但距离缩短，在产业工程化和商业应用场景等部分领域已经处于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的位置，开始迈入全球科技进步前沿的无人区。中国技术发展位置的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持续引入和学习国际先进技术、产业体系和供应链完整度较高等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依托于中国自身技术进步能力接近国际前沿、创新体系逐步改进的基本面。

（三）超大规模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是一个重要但尚未被充分挖掘的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不仅是超大规模市场，而且是超大规模市场经济，既包括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也包括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方面的超大规模市场。从全



球范围看，14 亿人口构成的统一大市场是没有先例的。人口数量多，并不意味着超大规模市场，有的国家人口多，但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已有数百年历史，但近代以来积贫积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过艰难探索，确立了市场经济方向，逐步形成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和物质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经济的优势已经显现。

基础三角结构：建设“制造强国” “消费强国”“金融强国”

在上述三类优势中，追赶潜能优势是后发经济体拥有追赶能力后都会具备的，新技术革命优势是追赶接近全球技术前沿时方能具备的，而超大规模市场经济优势则是中小经济体难以具备的。以三类优势的叠加协同效应为基础，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相适应，本文提出建设“制造强国”“消费强国”“金融强国”战略，作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基础三角结构”，驱动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循环体系。

（一）建设制造强国

建设制造强国的重点是提升技术含量与附加价值，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等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 30%，远超中国 GDP 占全球 GDP 18% 左右的比重，超过美、日、德三个主要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总和。另一方面，在部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值比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发达国家。以往我们说中国制造业是“大而不强”，近些年取得长足进步，但总体上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偏低的位置，呈现“大而不足够强”的特征。

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重点是持续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

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支柱产业增加值率。制造业需要在 GDP 中保持合理比重，但由大到强的重点不是规模扩张，而是提升与制造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比重，包括研发设计、物流与供应链管理、金融、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市场销售、教育科研等知识密集、高附加值领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即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就是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升级过程。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制造业的比重还会有所下降，“制造业 + 相关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表达这一过程。美国制造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占 GDP 比重接近 30%，此后随着深度参与全球分工体系，逐步下降至目前的 10%。与此同时，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上升到 50%，与制造业相加，合计占 GDP 的比重达 60%。中国目前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各接近 30%，相加后与美国的比重相近，但生产性服务业中的知识技术密集度、附加价值量等仍低于美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面对的主要矛盾不是低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产业的流出，而是无法解决这些产业流出后出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不能混淆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

在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新技术领域，应持续培育、发挥并扩展技术领先优势、工程化优势、多场景优势、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优势。中国科技和产业逐步走到了全球创新前沿地带，通过“制造 + 创造 + 智造”，在市场竞争中培育一批处在全球创新前沿、能够起到引领作用的大型科技头部企业，将是中国成为制造强国的重要标识。

（二）建设“消费强国”

建设“消费强国”，首先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消费大国。从发展阶段和消费质效来看，在严格意义上，中国还不能说是消费大国。当务之急是尽快补上消费占 GDP 比重较国际平均水平低 20 个百分点左右的结构偏差缺口，重点是稳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发展型服务消费。

由消费大国转向消费强国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让国内消费者也能共享全球范围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市场优势不仅体现为消费者的数量，还体现为购买力，而支撑购买力

的是稳定增长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民币币值。

现阶段重点发展服务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型消费，既可以看成是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培训提高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医疗卫生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创新驱动社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契合。这也是消费强国的一个显著标志。

（三）建设金融强国

建设金融强国是依托现代化金融体系为制造强国和消费强国建设提供服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简单地说就是选项目，选出有市场、有效益、有前景、风险可控的好项目，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复杂度、不确定性的增加，金融体系选项目的能力也要相应提升，这就是由传统银行体系到现代资本市场体系演进的底层逻辑。中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选项目的职能更多地要由金融体系来承担。

相应地，社会资金也将加速向资本市场集聚。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研究，^①资本存量（社会净资产）与国民收入的比例大概为5~6。“十五五”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4%~5%的增长速度，每年将会形成不低于30万亿元的社会净资产。以往较长一个时期，居民资产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房产占到居民家庭财产的70%左右。随着房地产需求进入历史需求峰值，行业增速大幅回落，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随降息下调，新增社会净资产将更多流向资本市场，参与股票或债券交易。社会净资产存量调整也将呈现类似趋势。源头活水的大量增加，将推动资本市场进入一个与以往显著不同的新发展阶段。

资本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从融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培育具有全球创新领先竞争力的大型头部科技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中小企业。从投资者角度看，资本市场要显著增加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占比，在稳定资本市场运行的同时，为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更有力的资金支撑；与此同时，通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持续增加投资者的财产性收入，在扩大居民消费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金融强国的另一个关键性标识是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的份额，是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相比之下，人民币国际化地位还有较大差距。“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这一差距的突破口，是大幅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规模经济”。

强势货币具有大量进口以本国货币支付结算的特点。当英国进口占世界其他国家出口总量的30%，且全球约60%的贸易往来以英镑结算时，英镑才真正成为世界货币。美国通过大量进口商品和服务以美元计价，实质上是向全球注入美元的过程，由此形成大规模的离岸美元市场，支撑了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国之所以能发起关税战，是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国的消费市场，美国是全球贸易体系最大的甲方。事实上，中国人口规模约为美国的4倍，当经济增长和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进入消费强国阶段后，中国完全可能形成规模远超美国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为此，中国需要实施一种新的对外贸易战略，即进出口基本平衡，在存在大量出口顺差的情况下，主动增加进口，改由人民币支付结算。比如，202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按海关统计数据接近1万亿美元，占到全球份额的36%。如果不保留顺差部分，转化为进口对应规模的货物和服务，以人民币支付结算，这将带动人民币跨境支付规模显著增长，进而有效扩大目前仅有1万多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有序地扩大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在内的人民币金融产品供给，增加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使用便利性。当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达到某个拐点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多项职能在全球的占比将显著上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加速推进。

^①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定义了收入与资本，收入是指流量，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去折旧后的部分，资本则指全社会累积形成的资本存量。在当今发达国家，资本/收入比一般在5-6之间波动，是衡量财富积累和分配不平等的重要指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作出战略擘画，这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把握好两条发展的主线，深入认识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温度。



夯实基础与全面发力： 把握好两条发展的主线

（一）主线一：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加速展现，并且发生质与量的跃升

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分析中国当下的经济形势，不难发现，目前处于多重周期叠加的底部，我们思考问题就不能简单局限于底部各种现象的解读，而是需要尽可能摆脱周期力量扰动，看透跨越周期的力量。

这条主线的第一个支撑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持续存在并且持续巩固。这条主线的另一个支撑点，是五链融合形成的一套体系化、机制化的内生创新驱动体系，和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它们为“十五五”时期续写中国经济奇迹打下坚实基础。

纵观过去十几年，我国经济增速从“十二五”的平均 11.7% 调整到“十四五”

夯实基础 全面发力

——“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温度

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教授

的 5.4%。但是，我们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瞩目的奇迹，即技术的前沿化、产业的高端化和创新的体系化。从世界工业化进程来看，美国达成这一目标耗时 60 年，德国和日本也历经 40 年，而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完成用时不到 20 年。仅从 2025 年看，中国经济展现的坚实发展基础与强劲韧性也是有目共睹：我国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A 股市场总市值突破 100 万亿元；全球创新指数进入世界前十；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超过 50%；等等。

历史表明，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指标是：能否真正进行高效的基础研发，能否进行持续迭代的产业升级，能否利用现代金融方式持续支持研发和产业升级并且形成良性闭环，也就是所谓的新“三驾马车”。这既是支撑一个国家和民族穿越周期的核心力量，也是破解短期问题的深刻密码。

比较研究显示，美国科创模式主要由以下部分构成：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顶尖基础和应用研究；军工复合体推动的科技转化体系；以 VC/PE 为主体的科创金融所形成的强大技术创新孵化体系；由七大头部公司所形成的集团化研发体系。我国科创模式目前吸收了美国的一些成功经验，同时创新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在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构建出新型举国创新体系。在这套体系的作用下，我国不仅成功实现了赶超的目标，而且在很多领域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到领跑。近日，国家发改委牵头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启动，覆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形成全方位支持。

近年来美国也在进行一系列调整，主要表现为开始在国家体系里专门设立未来产业研究所，也意味着美国产业政策的全面回归；在原来三大科学研究基金基础上设立大量的新型基金，对各种高端产业、前沿

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全面支持；特朗普政府依托几大法案进一步放宽对于头部公司的监管，很重要的一点是允许其发行超长期债券为 AI 相关领域融资。

这些重大调整源于美国智库开展的很多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比如美国前财政部长耶伦提出，中国创新驱动的战略体系已经成形并具备超级竞争力，美国必须在战略体系上调整，否则在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中难以赢得胜利。再比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对我国十大行业进行系统性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虽然尚未实现整体领先，但是已经建立起市场需求导向的正向循环的创新体系，明确提出美国创新体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2025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吉翁也专门谈到，中国和美国在新技术上都有自己的体系，均以领跑者的身份行动。因此，我们也需要对于中国创新体系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一个科学的判断。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的几次演讲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一场科学革命并不意味着产业革命的胜利。比如，第二次电力革命主要是英国推动的，取得更大收获的却是德国和美国。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主要是美国推动的，取得更大收获的可能是中国。无制造则无设计，无设计则无创新，第四次科技与产业革命是由场景驱动，而不是单纯由实验室或者象牙塔驱动的。场景驱动最重要的场景就在中国，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超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

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框架已基本确立，正在全面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内生性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对传统增长模式的替换，将为解决短期问题与周期性问题筑牢基础。发展是我们解决各种短期问题和发展困扰的根本路径。

（二）主线二：“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再平衡的关键阶段，各种周期性力量反转以及周期性政策持续加力，将带领中国经济最终走出艰难的周期底部，形成新的供求平衡

宏观经济学其实主要就两个问题：一个是增长，一个是波动。我们要看到经济增长主线的前景，也要深刻认识经济波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是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的交织，而且较之以往的周

期性问题要复杂得多。其突出体现在如下三点。

其一，新一轮康德拉季耶夫技术周期开启。科技创新的加速使原来人家可能十年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在两三年内解决；原来人家二十年面临的问题，我们可能在五年内面临。比如 AI，经济学领域涉及 AI 谈得最多的是索洛悖论，技术出现之后不是能够马上拉动经济的增长，就像熊彼特创新理论里面谈到的创造性毁灭，毁灭后再创造，这个过程很复杂。

其二，房地产库兹涅茨周期调整开启。最近一些文献在总结近百年来 27 个国家房地产危机所产生的一些规律性变化。一般认为，较为剧烈的房地产危机会导致一国 GDP 大幅下降。房地产冲击会导致市场主体各种资产负债表失衡包括房地产价格下行以及资产价值缩水，这也是经济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资产负债表修复是房地产调整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①

也就是说，房地产的调整一定会对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带来深度的冲击而非小感冒，这是人类历史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无法跳脱的周期性规律。当前我国房地产的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一，以保交楼为主体，防止房地产风险向社会风险进行蔓延；第二，通过房地产融资白名单制度进行流动性管控，防止房地产开发企业持续暴雷，进而引发房地产金融风险向整体金融风险蔓延；第三，房地产下行调整的走势整体仍未企稳。也因此，2025 年 7 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对房地产的调控进入新阶段，即由增量扩张全面进入存量提质增效阶段，同时以新型城镇化与城市更新作为两条主线。

其三，投资周期与债务周期的叠加。其决定了中国投资将在走低触底后，于“十五五”中期进入复苏—高涨阶段。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是固定资产

① 赵燕菁：《重新理解增长——一个基于会计学的宏观经济模型》，《探索与争鸣》2025 年第 9 期。

投资出现负增长，甚至比消费带来的压力还要大。这一压力源自房地产行业调整以及地方政府财政吃紧，不少企业投资利润率触及 5% 这个关键临界值。但新一轮技术与产业革命以及国家替代，将使新投资大幅度回升。

“十五五”时期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温度

在多重经济周期叠加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还能保持平稳运行，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科学决策、精准决策。从方法论来讲，周期轮转属于最基本的一种规律。我们不期望消灭周期，但是希望尽可能熨平周期过度波动，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目前我们的学术判断是，2026 年应该是周期的底部，2027 年前后呈现出周期性复苏应该是大概率。这里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切忌将周期性问题的固化，短期问题长期化。

（一）发展的速度

上述多重力量共同决定的发展速度是什么呢？这就要回到经济增长面临各种要素的制约，短期波动和下行压力很大，但是中期的前景是乐观的判断。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正在形成，预计“十五五”开局之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保持在 4.5%~5.5% 区间，我国在回归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同时，名义 GDP 增速将实现较大幅度的回升，并将形成稳中向好、前低后稳的新态势。也就是说，预计 2026 年的经济压力依然会很大，低于潜在增长率是正常的现象。具体来说：

一是经济增速。2025 年的全年经济增速在 5.0% 左右，总量达到 140 万亿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人均 GDP 或将超过 1.4 万美元。

二是人口因素。人口总量延续负增长，

到 2030 年预计人口老龄化率会超过 20%，尤其要防范 16~65 岁的劳动力人口负增长滑入警戒线。与此同时，研发人才红利将会在“十五五”时期加速释放：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已经达到 7000 多万人，是世界第一；不过创新人才红利仍受制约，如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薪资水平在全世界范围看依然较低。

三是债务率和储蓄率。过去中国显著的发展态势很重要的基础参数是储蓄率很高。也因此，很多人盼望储蓄率能够下降一些，消费率能够上升一些。但是储蓄率的快速下降也会产生资本积累能力不足等问题。

四是新兴产业。随着以 AI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全面崛起，以及一些关键“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加上全面深化改革的资源配置效应，TFP 驱动型经济增长将在“十五五”时期加速形成。IMF 2025 年报告指出，AI 的应用可以将密集使用 AI 国家的经济拉高 0.8~0.9 个百分点。2025 年美国第三季度 GDP 环比增长率达到 4.3%，2026 年美国 AI 领域的资本支出将会迸发，18 万亿美元的投资将于未来 2~3 年内完成投入，因此相关研究预测，2026 年美国 GDP 增长速度有望突破 2.5%。^①

当然，目前对于美国经济的讨论经常处于极化状态：一方说泡沫很严重，必将崩溃；一方说前景很光明，中国竞争压力将急剧上升。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讨论是，中国在技术进步、创新模式上能否真正形成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这几年我们经常陷入一个悖论——技术进步很大，产业升级也很好，但是企业盈利有限。在人类 400 年市场经济史上，这种现象出现过三次。典型案例是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出现的超级黄金时期，技术进步很大，产业升级很好，最后反而出现了大萧条。

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还要闯过一个关口，即如何将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进一步借助市场成功地转化为企业收益，形成创新升级的闭环。这个闭环目前还没有真正完成，也因此需要在反内卷运动、政府治理体系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做大文章。

（二）发展的质量

“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的质量和结构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支柱产业的转换。其中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增加值占 GDP

① IMF:《2025 年全球人工智能影响报告》，新浪财经，2025 年 11 月 19 日。

的比重将可能从2020年最高的15.3%下降到2027年的12%，预计未来稳定在国际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约13%的水平。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将大幅提高。2022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房地产与建筑业总和，预计“十五五”时期将稳定在18%左右。这一调整的过程势必是个阵痛期，也是高质量发展必须经历的阶段，支柱产业转换将在“十五五”时期完成。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将迎来结构性变化。高科技股票的价值将持续凸显，无论是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都在加速这个变化。我们也会看到制造业在未来的一些变化，特别是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加速分化。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3.2%，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值60%，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美国。消费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除了未来消费结构、消费总量，消费率的变动可能比任何参数变化更难测算，它的黏性比投资和出口还要大，“十五五”时期能够提高2个百分点已经非常可观。

（三）发展的温度

基于上述速度和质量的变化，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结构性调整，我们的发展温度会怎样？

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民生为大”。2026年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做提高“民生体感”的事情，同时稳步改善一些关乎“市场体感”的指标。2026年我们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大致为4.5%~5.5%，CPI目标是2%，名义GDP增长速度大致是5.5%~6%，而2025年四季度我国的名义增速约为4.1%左右，不仅今年，明年的发展任务也将异常艰巨。

5.5%~6%的名义GDP增长速度，意味着当下政策导向和发展定位要与过去存在显著差异。而我们目前的“体感”主要基于4.1%的名义增速，其对应的参数大致是：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1%~2%；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需要提醒的是，这是一个平均数的统计或者中位数的统计。如果进一步分类分群进行测算，4.1%的名义增速所对应的居民收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都将面临压力，尤其是边际人群的收入状况亟待改善。因此，“十五五”

时期我们将会看到，前两年依然可能面临着低物价的困扰，其较之高物价问题更难治理、更难破局。未来两年我们能否推动CPI由0时代回归到2时代，PPI由-2%到-3%的水平回升到0时代，同时GDP平减指数从目前的-0.8%回归到正值区间，都是异常艰巨的宏观经济发展任务。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要继续勒紧裤腰带，要过点紧日子。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我们有信心全面回归到正值区间。2026年CPI就有望回到2时代，当然，这极大地取决于我们反内卷行动的成效。如果未来CPI由0时代步入2%~3%，PPI由负转正，名义GDP增长速度也会再次步入6%~8%的区间。如果名义GDP增长速度能够达到8%以上，全民的“体感”一定更加美好。当然，这需要我们勇于驾驭短期和周期性问题，使我国增长的潜能、大好的历史战略机遇，持续转化为民族复兴的驱动力。这考验我们的政策智慧，也要求进一步明确中长期战略定位。

概而言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将在“十五五”时期加速显现，核心原因是内生性创新驱动增长模式使我们拥有了穿越周期的密码。其中，产业高端化、技术前沿化以及创新体系化共同支撑了中国创新驱动模式的形成，依然需要加速结构发展改革；房地产市场的平衡运行、反内卷行动的成效以及不平衡问题的破解，依然是“十五五”时期的核心议题，均衡的新发展格局将决定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多重周期叠加决定了本轮宏观经济形势的艰巨和复杂，也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气和改革的力度。但可以明确的是，“十五五”时期将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再平衡的关键阶段，多重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逆周期政策的持续加力，将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周期底部，实现新的供需平衡并迈向新的繁荣。

强 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

畅通国内大循环，本质上就是要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根本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是激活微观主体的活力，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当前就是要深入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妥善处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未来一段时期，可以从五个维度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统一国内大市场是实现空间意义和要素层面上的统一；推动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以及投资和储蓄的平衡，是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各环节畅通转换的关键；代际循环是我国当前人口结构转型背景下实现经济大循环畅通的关键；技术范式跃迁下经济增长动能和经济社会组织模式的转换，是实现经济在增长中良性循环的关键。

（一）统一国内大市场

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完成空间意义和要素层面的统一。统一国内大市场，既能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的优势，也能为更充分发展细分市场创造条件。按照我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部署，核心要求集中体现在“五

“十五五”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五个维度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统一、一开放”上，即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

近年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地方间“内卷式”竞争的问题。为了规范市场秩序，有必要深入整治。除了做好限产限能和维持正常的价格竞争秩序外，还需要加大对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力度。

比如，部分地方政府通过产业基金、政府补贴等手段，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甚至补贴亏损企业，加剧了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和价格恶性竞争。对此，我国加强对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行为的规范，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无效和恶性竞争，但也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一定的收缩效应。如何既能激发地方政府的活力和动力，形成地方政府之间的适度竞争，又能稳步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十五五”期间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当前国内市场分割的问题，既与我国当前生产型税制体系有关，也与地方官员的考核评价与追责制度有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快推动税制改革，从生产型税制体系转向所得型税制体系，包括加快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和下放，使地方政府的激励与企业的经营效益正相关，与人口的流动方向正相关。

（二）实现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

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生产与消费的动态平衡，尤其是要避免出现经济危机式的剧烈调整。近些年，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供强需弱”的重要特征，或者说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状态。其中，投资和出口仍是我国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占比相对较低。我国仍处于建设发展期，需要通过投资增加人均资本存量，扩大经济增长潜力，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出口对总需求的支撑作用，不仅是对国内需求周期性的补充，更是嵌入国内经济

结构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国基本度过高投资高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呈现边际递减态势。传统“铁公机”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峰值已过，以土地财政支撑基础设施建设的模式完成了历史使命；房地产建设高峰期已过，正在探索新发展模式；截至2025年，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已超30%，制造业投资持续多年高速增长，继续维持高速增长态势确实很难。

可见，我国到了从侧重供给侧、生产端发力，转向需求侧、消费端发力的阶段。与此同时，我国正在步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拉美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症结在于，在未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稳定的供给能力的情况下，过早引入外资和激发国内需求，最终导致经济发展失去支撑。当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具备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充足的产能。因此，有必要从产业布局拓展到需求开发，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新模式，促进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当下，我国亟待构建适配激发和释放需求的政策体系。我国宏观管理与宏观调控整体还是偏重于生产端。例如，我国长期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产业、科技和金融良性循环”，强调国家安全（包括能源、粮食和供应链等），重视供给端的改革和发展。“十五五”期间要更加注重“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要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密切结合起来。建设民生社会要求我国构建能激发和释放需求的政策体系，特别是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就业、教育、养老、健康等方面精准发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实现生产与消费平衡的关键，是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其涵盖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也包括产业、区域和城乡的结构差异，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差距等。其中，重点是理顺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以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关系。“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尤为重要的是

提高中低消费倾向群体的收入占比。具体而言，要着力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劳动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

（三）实现储蓄与投资的有效转换

投资决定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投资方向的选择和效率的提升也至关重要，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要求储蓄向投资高效转换。

我国主要存在两类储蓄与投资的转换模式：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二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

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主要由发改委的规划引领和项目审查、财政部的绩效考核和债务管理、金融系统的资金补充构成。与政府主导的投资相关的资金，一般有三个方面的来源：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用于公益事业的一般债和专项债资金以及特别国债资金。一段时期以来，地方融资平台成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融资和项目实施载体。这一投融资体制依循宏观的资源再配置。初期，借助“工农剪刀差”、重要物资的全国统筹、外贸外汇的管制等解决发展瓶颈问题，之后释放的经济增长潜力获得足够的资产增值、税收收入等，有助于实现投入—产出的平衡。在房地产快速发展期间，主要是基于“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实现投入—产出平衡，以专项债为例，大约80%以上的本息偿还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目前投融资面临较大困难，亟待在建设现代产业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探寻新的可循环模式。

金融是我国另一个重要的储蓄投资转



换机制。理论上，金融是基于信任关系、以效率为标准的资源优化配置工具。多年的实践表明，我国的金融体系运行适应于追赶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面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在储蓄投资转换作用上的不足开始凸显。其主要表现有：一是我国金融系统的储蓄投资转换受制于债权思维。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债务驱动，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使得市场主体面临债务压力。二是资本形成的能力不足。资本的本质功能是“看见价值、形成价格、达成合作”。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不论是在“看见价值”，还是“形成价格”，抑或“达成合作”方面，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三是与优化配置的“效率”逻辑有差距。目前不少行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资源的长期配置效率不高，机制存在一定扭曲，难以在较长时间内坚守“效率”逻辑。“十五五”期间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相应地，可探索金融与财政相结合的新型政策工具更好地推动我国有效投资的合理增长。

此外，有两个问题也需要加以关注。

其一，人口老龄化对储蓄和投资的影响。老龄化到底带来的是储蓄率的上升还是下降？会形成低利率还是高利率？从微观上看，老年人退休后成为纯消费主体，对社会储蓄的净贡献是负的，在特定投资需求的情况下，会导致社会储蓄率的下降和利率的上升。但从宏观上看，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更多的群体处于高储蓄（率）年龄段。社会总储蓄率的水平与年龄结构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人口老龄化往往会导致社会趋于保守，创新不足带来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需求也会下降。因此，老龄化背后既是储蓄率的变化，也是保守与创新之间的较量。在这方面，日

本的经历尤其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特别要关注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创新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和利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的风险。

其二，在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前提下，我国转向的是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时代。消费主导的经济是相对成熟的经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低。因此，我国要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将经济增速维持在合理区间，必须保持适度的有效投资。这个阶段应如何确定和调整投资的方向和模式，以及如何评估消费和民生福利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变得尤为重要。

（四）实现代际循环

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在代际传承和代际公平中实现代际循环。代际传承既包括通过债务和税收、投资和消费等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实现刚性平衡，也涉及代际权利与责任的合理划分。每代人都有自身的时代特性和使命任务。“后代人”既是“当代人”建设成果享受者，也是“当代人”决策的被动承受者。当前社会上出现的“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暮气沉沉的年轻人”的现象就值得关注。其背后反映了代际循环遭遇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如成长机会、代际收入分配和财富传承以及养老体制等问题。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四五十年时间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同环境下成长的两代人有着显著差异。老一代生活在物质短缺但有大量增量机会的时代，年轻一代生活在物质丰富，注重情绪价值，但存量竞争严酷的时代。当前，单纯靠“跑马圈地”就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的机会相对有限，特别是制造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已相当饱和，时代转向创新驱动，注重存量优化。因此面向未来的经济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充分回应年轻一代的诉求，给予更多年轻一代成长的机会，或者说，创造合适的机制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服务时代。

我国养老体制的优化也面临一定的挑战。目前不仅存在养老金缺口问题，而且多套养老金体系之间也有较大的差异。“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要求，“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当下，部分群体的养老金替代率过高，明显高于年轻人的工资水平，在年轻人就业率面临挑战的时期，“啃老”成为一种突出

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一种非良性的收入“代际转移”机制。此外，随着老一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将迎来二代接班潮，财富的传承、观念的转换与时代的更替将相互撞击。

代际循环的另一个突出矛盾体现在低迷的生育率上。当前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低，2024年约为1.0，处于危险的极低生育率区间。这与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也与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和文化观念有关。快速老龄化和极低生育率并存给代际循环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不是短期政策能轻易解决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已经作出初步的制度谋划和政策设计。未来，需要更深层次观念转变和制度变革，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民生社会。

（五）技术范式跃迁下新旧动能的转换

我们正处于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换的十字路口。社会基础技术范式的跃迁，正超越技术领域，开始改变经济运行的逻辑和社会的组织方式。虽然“未来已来”，但我们中绝大部分人的绝大部分认知其实还停留在旧时代。我们在共塑这个新时代的同时，不断完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知。

对于数字时代，一种认知是通过数字化将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映射到数字世界。世界运行的基本逻辑没变，只是呈现的形式和运行的空间改变了。但这只是“开始”。数字化实际上还打碎了组建现实社会的最小原子的黑箱：自然人和法人。在数字时代，我们可以穿透自然人和法人，将自然人的各种属性（所谓的“画像”）和法人的内部程序及部门，在超越自然人和法人的边界外进行优化组合。社会正在结构层面乃至更细颗粒度上重构，曾经的“中心”正在瓦解，未来的“中心”正在酝酿和形成。

这引发了如何看待新的集聚模式——平台经济的问题。平台经济不同于自然人、法人的竞争模式，它上升到生态的竞争，背后是规则体系的竞争。这是新技术范式引发的“降维打击”，是新一轮“煤油灯与电灯、马车与汽车”的转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平台经济”下的垄断与竞争，如何看待数字时代与工业时代转换中的“破”和“立”，如何规制深层次的“破坏性创新”？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

要“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平台经济形成良好生态。

而加密资产和稳定币更是数字时代涌现的新课题。真实世界资产（RWA）和稳定币将现实世界与链上的数字世界相互锚定，搭起了现实世界资产、货币与数字世界的资产、货币的桥梁。这个世界刚刚打开，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稳定性，处于规则形成和秩序构建阶段，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尚未完成有效分层，监管机制尚未成熟定形……但迭代已经开始，未来如何发展将高度取决于市场和监管部门如何认知和应对。具体而言，加密资产的发展，正通过密码学、分布式账本、人工智能（智能合约）等数字技术，在传统金融基础设施之外构建新的金融基础设施，传统金融和现实世界的融合正从边缘、灰色（规避监管）向中心、合规化过渡，以新的、更有效的技术方式实现货币的支付结算和金融的融资功能。这是传统技术范式支撑的世界向新技术范式支撑的世界的迁移，金融规则和版图都将重构。

此外，AI引发的效率提升与优先保障就业的矛盾也将更为凸显。数字化和智能化对效率的提升，预计一段时期内将以“裁员”的形式呈现，这对我国而言挑战不小。

总之，做强国内大循环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重要战略部署。我国应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相结合，将“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紧密结合，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与此同时，我国也需要在供需平衡、投融资转换、代际循环和新技术范式跃迁等方面推动制度改革和结构优化，更全面地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双循环战略是“十四五”规划《建议》稿的重大部署。回顾过去五年，双循环取得了显著成效。对内，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潜力持续释放，产业升级与创新步伐加快，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外，我国对外贸易展现了巨



大的韧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提升。这两个方面因素的协同效应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实力，有效地对冲和缓解了当前地缘政治恶化对我国的冲击。如特朗普常言的“手里有牌”，中国的牌不仅在于我们有稀土等稀缺性的战略物资，更在于我们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比较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格局，以及较强的发展韧性。

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稿重申了“双循环”的战略构想，强调“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这一要求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推动“内循环”潜力巨大，国内统一大市场虽然初步建立但仍不完备，地区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聚焦内循环意味着我们当前发展战略的基点依然是国内需求，在国内需求较为疲软的情况下，这一战略基点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另一方面，做强“内循环”有助于双循环战略的进一步落实。现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地缘政治持续紧张，产业链变动和重组错综复杂，有些情势难以

推动和做强内循环要处理好几对关系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控制、难以预测；但是，推动和做强内循环是分内之事，是完全可以自主控制的。

当然，现阶段我国内循环也存在不少“堵点”和“痛点”，突出体现为商品和各类生产要素流动不够顺畅。这一状况除了受客观因素的影响，还与一些观念上的偏差紧密相关，没有真正领会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核心要义。本文主张推动内循环要着力克服观念上的偏差，重点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消费与投资的关系

社会上对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一直有些争议，从现实逻辑来看，在当前内需相对疲软的情况下，既需要积极扩大消费，也需要注意增加有效投资，二者不应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应结合具体场景，对二者作更为细致的学理化分析。例如，对当前各项促进消费的措施，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为了扩大消费，当前的激励举措有很多，有的地方推出“以旧换新”活动，有的地方发放各类消费券。媒体也频繁报道地方政府投入多少资金，拉动多少消费。但是真实情况到底怎样？效果到底怎样？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评估。具体来说，在通常情况下，消费的场景是怎样的？如果没有这些消费券，居民的消费金额是多少？这部分基数需要作相应扣除。另外，还需对提前消费部分做相应扣除。最后的增量，才是真正由于采取了相应刺激消费的举措而产生的额外消费。拆解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类刺激消费措施的效果，使消费提质增效。而实现消费持续增长的一个根本途径是增加居民收入，消费本质上是收入的函数。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加居民的收入”，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居民收入一般包括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资本市场，使投资

者能从经济增长中合理分享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增加就业，进而带动消费。政府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不仅是缩小收入不平等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也是扩大消费的有效举措。经济理论和实际数据已经证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高收入人群。换言之，增加相同金额的收入，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支出要高于高收入人群。另一方面，增加就业也离不开投资的增加。对于投资还有没有空间，也一直存在争议。不可否认，一些无效的投资确实存在，但是有效投资的拓展空间依然广阔。

其一，基础设施有“硬”和“软”之分。“硬”是指铁路、高速公路等传统“铁公基”，“软”是指高科技产业、产业升级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等。我们往往提“AI+”，其实更关键的是“+AI”，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的“+AI”应用思路。比如，蚂蚁集团等有能力研发大模型的头部企业，需要探讨的是这些大模型在哪些领域可以落地应用；普通的企业则应积极探索本企业在哪些场景可以运用大模型，如何借助大模型助力本企业乃至本行业提质增效。其二，各类社会民生事业也有巨大的投资空间。前段时间中央出台育儿补贴，学龄前教育补贴等政策措施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同和支持，大家希望能够继续在这方面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对人的投资”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其将投资与消费有机地联结在一起。

当下，中央财政尤其需要在扩大消费、投资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有三。一是中央财政负债占比整体不高。尽管我国当前整体债务水平处于较高区间，负债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但其中企业占大头。截至2024年年末，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超过55%，政府部门和居民合计占比不到45%。^①就整体负债的比例而言，政府和居民占比差不多；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负债比例有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负债占比63%，中央政府负债占比37%。^②如果跟全球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央政府的负债在规模和比例上还有不少提高的空间。二是中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财政统筹调控能力较强，能够从各个方面集聚资源。目前中央和地方

的事权、财力并不匹配，后者的事权重、财力弱，需要进行调整优化。三是中央有货币发行权，而地方政府不具备，这个差异至关重要。人民币目前虽然还不是全球储备货币，但具有较强的信用支撑。信用货币跟金本位时代的货币存在本质区别。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与实物大致上是一一对应的，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货币增量往往难以跟上，因而具有通缩效应；而信用货币是有一定弹性的，适当的扩张政策能够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当然，这种扩张必须是适度的。从当前形势来看，应转变农耕时代“量入为出”的传统思维，实施更为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我们要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这是扩大消费、增加有效投资的必要举措。

高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处理好高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涉及生产力合理布局这一重要议题，对做强内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高科技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的新突破和广泛应用正在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发展的同时，也要注意保留和升级一些传统产业，进一步延伸和完善产业链。完全抛弃传统产业是一种片面的想法。传统产业只要有市场需求，产品有销路，能够盈利，就有保留的价值，但应积极鼓励其升级换代。

我国是全球唯一全产业链国家，既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又有益于整体经济保持韧性。当前，我国就业人口占比持续下降，

① 参考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5年。

② 参考蓝佛安：《国务院关于2024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2025年9月15日。



但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所以，保留部分传统产业，对于稳定就业非常重要，对于保持社会稳定更加重要。

我们也应注重发展高端产业，但是高端产业是以传统产业为基础不断迭代升级形成的。以电视机为例，当前我国能够生产平板电视机、大屏幕电视机等各类新型电视机；而美国则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其在20世纪80年代就退出电视机生产领域。在此意义上来说，一个产品的升级换代必然以原有产业为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类产业发展的教训。推而广之，产业链的升级是动态的，虽有跃迁，但也有连续性，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一蹴而就。尤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初始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更需重视这一点。

另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大多数。它们虽然有引进高新技术的需求，但在更多时候传统产品和传统产业可能对它们更为适用。因而，我们保留和发展传统产业，向这些国家输出适配的产品和技术，将会有助于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总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既需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需要保留和提升传统产业，其在创造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保留了现有生产力。这不仅是推动内循环的需要，也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需要。

企业出海与就地深耕的关系

近些年随着我国国内经济的转型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涌现了部分企业出海的热潮。这一热潮形成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企业规避国内过度竞争的考量，也有规避地缘政治负面影响的诉求，还有谋求海外进一步发展的愿景。各级政

府应该积极支持和指导企业出海，同时也要为那些不出海就地深耕的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企业出海后可能会遇到新的、难以预测的风险。比如，有些企业为了避免美国对我国加征高关税而将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却未预料到美国对这些国家也加征高关税，使其耗费大量成本的布局与预期化为泡影。另外，有些国家政治不稳定或不遵守国际公认的法律和惯例，也可能给出海企业带来产品被没收、营业执照被吊销或罚款等无妄之灾。因此，我国要规范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鼓励上下游企业抱团出海，在当地设立产业园区。

出海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自主行为，不应搞成跟风热潮，也不应搞成运动。理论上，不宜对企业出海给予各种所谓的奖励和补贴，特别是现金奖励，这不仅对其他企业有失公平，也可能引发不必要的国际贸易摩擦。一些自媒体经常鼓吹“不出海就出局”。对于个别企业或行业确实存在这种情况，但是不应该用这样的口号去推动企业出海，因为企业出海不全是正面效应，也可能面临上述不确定风险，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带来一部分税收流失、一部分就业岗位转移。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谨慎，要避免出现产业空洞化；尤其要保护企业的核心技术，可以考虑将部分关键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将企业出海与发展健全国内产业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既有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也筑牢了做强国内循环的基础。

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关系

在继续做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应该继续强化，尤其要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金融是经济的“血液”，这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至理名言，实体经济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因此，中央强调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也强调了这一点。

资本市场已经并将继续在金融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直接连接需要资金的企业与有剩余资金的个人或机构，直接融资的效率高于间接融资，也即以银行作为媒介进行融资。长期以来，我国间接融资占比远高于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转型逐步展开，这种状况应该会逐步改变。经济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局面已经并将继续转变，房地产行业发展天然依赖银行信贷支持，而高新技术产业与创业企业的发展需要股权融资。大力发展各类股权融资工具、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是“十五五”期间金融业的重要任务。

实体经济的顶端是高科技。高科技与金融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高科技的发展需要大规模资金的持续投入，高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显著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拓展金融业服务覆盖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客户服务、风险识别和投资机会筛选等金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最近数字人民币提级，从M0现金版升级为M1存款版，这一升级意义重大。数字人民币从此前的不付息，变为现在按活期存款支付利息，显著增强数字人民币的吸引力，为其更广泛应用创造必要条件。数字人民币提级还进一步提高了跨境使用的可能性。目前，我国与阿联酋等国家与地区共建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在这个平台上运行央行数字货币（CBDC）。数字人民币提级后，不仅提高了这些货币桥的运行效率，而且提升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央行数字货币平台的互联互通水平。如此，我国金融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社会实体的结构可以基本保持不变，也就保证了至关重要的金融稳定。

在金融业的高水平开放尤其在做实“强大货币”方面，“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这一部署抓住了我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核心，即资本项目的开放水平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以及金融开放的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前者的进一步开放，就谈不上后两者的发展。当然，在目前国内金融体系韧性还不够强、国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风险比较大、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我们更应该强调稳步推进，可在若干自贸区先行先试、局部突破。强大的国际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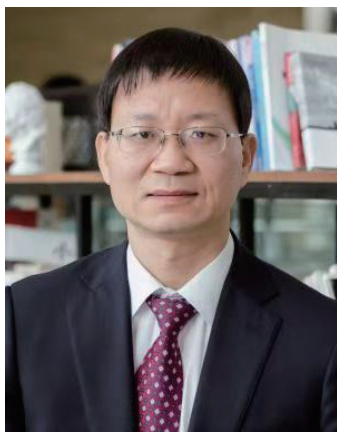
中心建设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要素之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再次强调。对于上海来说，这是一项重要任务，必须全力以赴，可以在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方面先试先行，力争在这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突破。

此外，全球跨境金融设施出现的重大变化，主要是跨境支付清算在量和质的方面都显著提升。随着全球跨境经济活动增加，跨境资金流动规模大幅度增加，将带动跨境支付清算增加。需要注意的是，全球跨境支付清算的手段和机制也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机制是代理行加全球跨境支付报文系统，现在出现数字化的点对点的跨境支付。这里的数字化既包括数字货币，也包括各国快速支付系统的联通。我国有央行数字货币桥，也有与阿联酋等国家快速支付系统的互联互通，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拓展和升级目前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促进跨境资金流动，从而推动做强内循环、扩大内外双循环。

概而言之，处理好上述几方面的关系，将从不同侧面推动和做强内循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关联经济增长的动力；高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涉及生产力布局的优化；企业出海与就地深耕的关系直接影响国内外循环的联动效能；而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关系则关乎产业格局优化和生产要素高效流动。推动和做强内循环必须妥善处理好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需要澄清的是，并不是说关系的双方没有主次、轻重之分，本文强调的是坚持辩证法、杜绝极化思维。更何况，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本身就是以辩证思维统筹处理内外经济关系具体而生动的体现。这种主次、轻重的把握不是一成不变的，也是动态变化的。除此之外，比如改革与开放、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需要高度重视。

锚定现代化目标并动态优化经济

发展格局，是我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和宝贵经验。在启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深度依托国际贸易和全球市场的特征较为显著。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提出，



① 江小涓、孟丽君：《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管理世界》2021年第1期。

② 赵燕菁、宋涛：《经济内循环：底层架构与制度方向》，《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12期；赵燕菁：《重新理解增长——一个基于会计学的宏观经济模型》，《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9期。

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99页。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呈现出从外向型增长向内向主导—内外协同增长的重大转型。“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说明畅通内循环在我国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既有文献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内外循环关系进行了较多探究，如江小涓、孟丽君研究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内外循环的地位变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①赵燕菁等探究了推动经济内循环的努力方向，认为实现经济内循环需解决资本内生问题并培育本地市场。^②这些文献对于深刻理解我国畅通内循环的背景、方式及效应具有启发意义。畅通内循环作为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其视角、方法以及现实针对性等亦需拓展。本文拟从政治经济学视

我国畅通内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支柱

高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角出发，阐释畅通内循环的提出逻辑与实践路径，重点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在理论层面，如何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畅通内循环的学理依据和理论逻辑？二是在实践层面，如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明确畅通内循环的实践支柱与重点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循环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多个维度阐述了经济循环问题，并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经济循环理论，具有实践指引和启示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作为制度化的生产关系，发展格局作为上层建筑的具体表现，归根结底是由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生产关系会对生产力发挥促进或阻滞的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发展的最终指向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阶段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关键阶段下，生产力显著跃升与生产关系主动调整的必然结果。这种转变的指向是通过完善生产关系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二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③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一个具有关联的统一体，这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其一为总体性，即四个环节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经济运动取决于这些环节形成的整体状况；其二为互动性，即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在经济实践中必

须从互动的视角把握这些环节。现阶段我国经济存在需求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不能直接归因于某一环节，必须在四个环节整体和连续性运动中进行探究。

三是资本循环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了资本运动从出发点开始、再回到出发点的循环过程，强调资本循环需经过三个阶段、经历三种形态。资本循环的购买阶段与要素市场紧密关联，售卖阶段与商品市场直接相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存在内在关联，商品市场运行高度依赖各类要素的配置状况以及要素市场的运行状况。如果要素市场存在扭曲，则必将阻滞资本不同形态的顺畅转换，并通过影响初次分配而制约商品市场扩展。这种要素市场存在扭曲，也将在城乡区域层面对经济循环产生制约，不利于城乡间、区域间的持续协调健康发展。据此，经济循环必须关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的运行效率，统筹考虑不同类型或区域市场的对接状况。

四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可分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部类与消费资料部类。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是两大部类能够同时实现价值补偿（每一部类的产品能够销售出去，且有能力购买另一部类的产品）与实物补偿（每一部类能够为另一部类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且自身所需产品能够在市场中获得）。国民经济的顺畅运行要求不同部门的发展必须保持协调和动态平衡，否则会引发产业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扩大国内需求，是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在发展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丰富的经济循环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为理解经济循环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强调不同环节的内在联系，资本循环理论强调不同市场的关联特征，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部门协同发展的重要意义，为理解我国经济循环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我国发展格局必须随着发展阶段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调整的指向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比如，依据“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联理论，我国必须把握经济各

环节的协同特征，推进供求的良性互动与动态平衡；依据资本循环理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考虑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运行状况，提高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以及配置效率；依据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理论，推动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市场关系，推动不同部门与产业之间的结构平衡。

新征程上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的 实践支柱

新征程上我国强调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充分发挥国内大循环主体作用，这一战略部署还有明确的实践逻辑。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历史性跃迁，而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致生产关系变化，生产力跃迁内在要求对发展格局进行调整。构建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在经济维度对国内与国际关系、供给与需求关系、规模与结构关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畅通国内大循环正是重塑的内在要求和驱动力量。

从时序视角看，我国畅通内循环已具备坚实基础和巨大潜力。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一个在全球经济领域影响有限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从一个农村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转变为城市常住人口占主体的国家，从一个市场规模有限的国家转变为具有市场规模优势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78—2024年中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48%增至19.12%。^①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支撑和驱动能力显著提升，为将强大国内市场打造为中国式

^① 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

① 对外贸易依存度由进口总额/GDP与出口总额/GDP相加得到：进口总额/GDP：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IMP.GNFS.ZS>；出口总额/GDP：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EXP.GNFS.ZS>。

②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https://dataweb.usitc.gov/trade/search/GenImp/HTS>。

③ 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CON.PRVT.ZS>。

④⑤⑨ 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⑥ 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AGR.EMPL.KD>。

⑦ 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V.IND.EMPL.KD>。

⑧ 世界银行，<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reports.aspx?source=2&series=NV.SRV.EMPL.KD>。

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提供了强劲动能。从空间维度看，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仍处在低速增长阶段，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态势仍在延续。2006—2024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从64%降至37%，^①按照CIF（到岸价）计算，2017—2024年中国出口产品在美国进口产品总额中的占比从21.6%降至13.4%。^②这些变化表明外需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已然减弱，我国需要更加倚重国内市场来驱动经济发展，同时靠制度型开放等来实现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畅通内循环是一个涉及供给、需求、供需对接的系统化过程。我国畅通内循环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期，我国畅通内循环需要重点筑牢四个实践支柱。

一是需求扩展。其核心在于通过持续增强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解决“内循环如何发力”这一问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进行产品生产，总是希望完成从商品到货币“惊险的跳跃”，进而为再生产活动提供支撑力量。需求可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其中，消费需求是与居民生活直接关联的需求，是对投资需求具有牵引作用的需求。就影响因素而言，消费需求取决于居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结构以及社会保障程度。从时序意义看，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从横向比较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在跨国比较中仍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为39.13%，低于世界56.49%、高收入国家58.71%、中高收入国家47.94%、美国67.90%、欧盟51.59%、印度60.34%、巴西63.33%等水平。^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92%，其中，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1.79%，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

8.14%，^④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居民消费需求扩展的重要因素。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和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2007—2024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3.14倍降至2.34倍，但同期差距绝对数从9275.6元增至31069.0元，^⑤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成为制约内需扩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需要深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高就业创造能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从相对数缩减转向绝对数缩减，以此释放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效应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展效应。“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统筹促就业、增收入、稳预期，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立足需求维度对畅通内循环进行系统化战略部署。这些部署的关键是通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式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特别是推动更多农村居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从而为建立强大国内市场奠定更为牢固的需求基础。

二是产业转型。其核心在于形成与需求结构变动匹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此解决“循环什么产品”这一问题。畅通内循环既要有庞大的市场需求能力，也要有强大的产品生产能力，前者涉及居民购买力，后者涉及企业创新力。产业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集合，企业创新力通常体现为产业形态变迁和产业结构优化。我国畅通内循环需要从系统视角理解产业发展问题，着力构建不同类型产业之间具有相互支撑功能、各产业具备较强创新能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23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7713.5美元/人、^⑥28154.8美元/人^⑦与28696.1美元/人，^⑧产业间的发展不平衡状况比较突出，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农村需要提供更多新业态新产品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满足居民消费需要。产业结构转型以回应市场需求为基本导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2024年我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从63.9%降至29.8%，^⑨城乡居民对生态、文化、康养、信息、数据等新型产品的需求显著增长。这为企业创新和产业转

型提供了重要契机,我国必须依靠激发企业发展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等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真正实现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的良性互动。“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等,正是从供给维度发力为畅通内循环提供驱动力。

三是科技创新。其核心在于依托科技创新来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解决“循环何以连续”这一问题。从微观角度看,科技创新是企业产品创新的根基,产业转型升级也取决于科技创新程度。从宏观角度看,科技创新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涵式发展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科技创新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持续增强,科技成果转化需要大幅提高,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需要不断推进。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6—2022年中国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支出/GDP)从0.56%增至2.56%,但2022年该数据低于世界(2.67%)、高收入国家(2.92%)、日本(3.41%)、美国(3.59%)。^①根据佩恩表10.0的数据,2019年中国TFP约为美国的39.9%,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分别约为美国的93.7%、88.9%、63.6%与60.8%,^②我国科技创新在投入强度和产出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教育水平、人才培养、金融体系、科技向产业的转化机制等均会影响科技创新水平,进而对供需动态平衡和国内市场扩展产生影响。因此,我国需要持续加大对教育培训、基础研究、应用研发等的投入力度,依靠深化改革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健全对科研人员的保障和激励制度,充分激发各类企业和人才的创新活力,注重发挥金融在科技创新中的资金融通、风险分散等功能。“十五五”规划《建议》稿强调“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体现出依靠强化科技创新来持续畅通内循环的实践逻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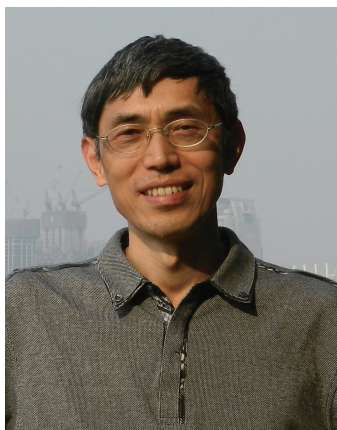
四是对接畅通。其核心在于通过建设统一大市场提高市场的交易效率,以此解决“循环效率怎样提升”这一问题。畅通内循环涉及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对接效

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流通过程来刻画这种对接效率,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来标度这种对接效率,均强调对接效率越高、市场主体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越低,对需求和供给的激励作用越强。1978年我国启动改革开放以来,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断发育壮大,微观主体利用市场机制的成本趋于下降。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发展中大国,处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要素市场化改革依然滞后于商品市场化改革,地区间还存在市场分割和产业同构状况,等等,这意味着商品和要素市场仍存在较高交易成本。例如,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城市资本流向农村仍面临较多制约。不同地区在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时,往往将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于新能源、新材料、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因地制宜地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且在区域间形成分工协同的程度有待加强。上述问题在整体上抑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不利于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发挥国内大市场主体地位。因此,我国必须将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特别要深化各类要素市场化改革,优化企业的营商环境,发挥数据在信息对接中的促进作用,在制度和技术等层面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此外,我国需加快完善地方政府激励机制和财政管理体制,打破地区内部、行业内部的“小循环”,依靠市场规则的统一化、规范化来形成分工经济和数字经济。“十五五”规划《建议》稿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凸显了市场对接效率提高在畅通内循环中的基础性作用,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内市场和经济运行制度保障的建设工作。

① 世界银行,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GB.XPD.RSDV.GD.ZS>。

② 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pwt-releases/pwt100?lang=en>。

春晚小品《开锁》曾呈现这样一种场景：一位客户请开锁匠上门给箱子开锁，开锁匠却要求先看身份证才能开锁，客户说身份证锁在箱子里，只要打开箱子就能看到身份证，但开锁匠坚持先看到身份证才能开锁。



中国生产和消费内循环的社会基础及重构

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之后，政府一方面延续新基建投入，另一方面从消费端发力来破解生产—消费循环阻隔难题，例如，“以旧换新”、发放消费券等一系列刺激消费举措持续落地。这些举措在激活和扩大消费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距离彻底破解“互倚性困境”，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那么，如何突破互倚性困境呢？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互倚性困境的突破路径不能仅靠政府直接投入财政资源，还必须依托社会力量形成协同配合。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就发动了“消费即爱国”的运动。这是社会力量介入市场领域的典型案例。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初期，纽约州的布法罗和罗切斯特就通过发动市民参与购物运动试图提振经济。前者反复宣传：“你的节俭就是别人的失业。”后者发起了面向市民的“繁荣承诺”运动（市民承诺在一定期限内消费一定金额）。^①

这说明社会在消费领域的集体发力需要一种氛围。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救市”被认为是政府的事，“花钱”被认为是老板的事，老百姓的事就是自济，即与家庭（族）同舟共济（互济），通过节省（而非消费）渡过难关。当然，从个体的角度看，这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无助于打破“互倚性困境”。而社会作为一个集合体要介入救市行动，就要求个人的个体理性与集体目标（打破“互倚性困境”）获得一致性。但是，两者并非总是具有一致性。如何才能让二者保持一致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回答“什么是社会”。

“公责赦免”的私域社会的发展脉络

社会既可以是相对于国家来说的（即国家与社会，市场在社会里面）另一方，也可以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在西方语境中，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大致平行的三个集合行动者，它们相互联系、相互

“互倚性困境”与“社会合作”的找回

当前我国生产和消费的内循环也面临类似境况：一些领域因市场饱和或需求萎缩使得部分企业压缩投资或生产规模，进而带来职员降薪、离职甚至裁员，消费需求亦发生萎缩。双方都希望对方率先作出改变，但似乎谁都无法先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形可称为“互倚性困境”。假定其他变量不变，只要生产者或消费者中一方能率先作出改变（企业扩大投资和招聘或消费者扩大消费），便有望打破互倚性困境，但实践中似乎陷入无解的僵局。这说明，我国生产和消费的循环系统出现了结构性阻隔。

此时亟需外部推动力来打破这一阻隔，而这一推动力的关键就是宏观政策。2008年，我国也曾遇到生产和消费循环的阻隔，当时政策的着力点是通过4万亿元财政投入启动大基建，率先激活生产端，进而强行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阻隔。新冠疫情

① Elvins S., “Shopping for Recovery: Local Spending Initiativ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Buffalo and Rochester, New York,”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vol. 29, no. 6, 2003, pp.670-693.

作用、相互约束。这里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国家和社会都是由人构成的，如果一个实体人归入国家或市场部门，还能归入社会部门吗？事实上，一个实体人可能同时归入这三个部门。人们扮演何种角色往往与场域有关，例如，这个实体人在政府场域扮演公务员角色，在商业场域扮演市场行动者角色，在社会场域扮演社会成员角色，同时承担三重角色。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区分，是基于角色集合体的分类。不同场域中的角色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例如，公务员角色要求遵循服务理念，商人角色以“在商言商”为核心逻辑，社会角色则崇尚互助、互惠、共济以及在扶持弱者上的利他和慈善理念。

在古代中国，社会更多表现为民间社会或家族社会，并与国家（官府）保持一定距离。在“皇权不下县”的治理格局下，社会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在村一级的社会中，村民之间不少具有血缘关系。这样的社会具有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的特征，依据血缘亲疏来决定关系远近。在此意义上，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更多的是一种私域社会，而非西方的公域社会（公民社会）。私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私域社会成员更关心私域社会圈内的共同事务，不太关心圈外的公共事务。他们奉行的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本地化而非公共性的道德。他们对待陌生人和公共事务的态度，截然不同于对待自己和亲友事务的态度。

儒家社会成员具有家国情怀，尤其当面对外敌入侵的时候，这种家国情怀会被迅速激活。但当外部威胁解除，人们对于私域社会圈外的公共事务普遍表现得相对冷漠。私域社会成员在对待公共事务（尤其是全国性公共事务）上，缺乏普遍主义的道德自觉；相反，在私域社会圈内的共同事务上，具有很高的能动性，愿意承担私域社会圈内的社会责任，展现出很高的道德自觉和义务精神。也就是说，私域社会成员更多关注自身事务，亲友圈外的公共事务往往被归于政府或国家。当然，由于我国领土辽阔、人口众多，个体力量渺小，也觉得公共事务离自己过于遥远。

这种“公私有别”的主体意识差异，带来了两个后果。一方面，儒家传统社会成员具有公责赦免（公民责任免除）意识。在处理全国性的公共事务时，个

体不仅认为自己无能为力，也不觉得有承担与解决这类事务的义务和责任。公共问题的解决，往往依赖政府、能人等。另一方面，儒家社会成员具有很强的私责担当意识。在面对私域社会或家族内部事务时，愿意作出自己的贡献，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员。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私域社会的范围也有缩小趋势，私责担当更多地被限定在家庭、家族和少数亲密的朋友范围内。

陈志武认为，为了抵御未来的各种确定和不确定的风险，必须借助社会合作。但合作存在成本，因此必须寻求降低社会合作，尤其是跨期合作的交易成本的方式。在儒家社会，家族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是低交易成本的、实现跨期合作的血缘组织，^① 不同于西方那种基于契约（以及契约精神）的跨期合作和跨地合作组织。以血缘为核心的关系网络是人们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社会组织形式。这种社会关系网络需要经营，方式通常是礼尚往来，相互拖欠未了的人情，^② 也就是相互帮助和接济。一旦某个成员遇到困难，就寻求借助关系网络渡过难关。而被帮助者也有义务在关系圈成员处于困难时对其施以援手。但当全局性公共问题出现时，私域社会成员通常缺乏意愿承担公域社会成员的责任，顺理成章地将公共问题的解决责任划归给政府，并对其履责持集体性高期待。当然，如果家庭的消费资源不足，他们往往也将其归因为自己的努力不够。

因此可以说，我国公域社会相对孱弱，私域社会更为发达。私域社会成员的公责赦免意识以及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职能的集体性高期待，也使得权力和资源进一步向国家集中，私域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进一步回缩。因此，当我们分析消费不振时，更需要思考文化方面的根源。

① 陈志武：《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上），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第231—290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当宏观政策被大部分居民认为与己无关、只属于国家的事务，只会被动地等待对己有利的“好政策”出台，而非事先去参与和影响政策。

面包部门与马戏部门的失衡

经济学家杜特等提出两部门生产技术理论。其挑战了马尔萨斯的单一物品（食品）约束模型，构建了两部门产出模型，即面包部门（提供基本营养或基本生存资料的部门）和马戏部门（提供让生活变得有价值或享乐产品的部门）。这两个部门的技术进步都对产出产生影响。他们在分析了新石器革命、古罗马、“大分流”和工业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在马戏部门的技术没有进步的条件下，单靠面包部门的技术变革（如新石器的农业技术革命）会导致人口的增加，但随后会导致生活水平的回落，因为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

工业革命则实现了两个部门同步的技术变革，且马戏部门的技术进步更为突出，这也解释了工业革命后虽然人口增加了，但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大幅上升。生活水平的上升主要不在于卡路里的摄取而在于马戏（享乐）产品消费的大幅提升。“大分流”（中国和欧洲在中世纪晚期之后的历史分化）之后，近代中国走向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面包（粮食）部门的生产技术尽管有突破，但马戏（享乐）部门的生产技术未实现显著突破。^①

私域社会的发达，尤其是私域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的强义务属性通常会产生两个结果。一方面，私域社会中遭遇困难的成员可以在国家之外得到私域社会其他成员的帮助。这种相互帮助的关系网络（朋友、家庭、亲属等）也构成关系社会，这类支持在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尤

为重要。另一方面，私域社会成员的相互帮助替国家分担了部分公共责任，但也可能使得许多居民共性难题的社会显示度降低，进而延缓了相关问题的解决进程。例如，商品房价格高昂，为了帮助子女在城镇买房，许多父母把自己毕生积蓄拿来帮子女付首付。又如，部分青年未就业、无收入、失业时，通过“啃老”的方式从父母那里获取帮助。这些私人关系网络的支持容易滋生一种误解，住房价格并未高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未就业青年的生活也并非十分窘迫。

在居民可支配收入有限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有不少完善空间的情况下，传统儒家“勤”和“俭”的伦理也被激活。儒家社会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私域社会，而私域社会维系和经营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礼仪。例如，每一个家庭都要举办婚礼、寿礼、葬礼等礼仪，仪式也是私域社会成员聚集的场所。一般主人会邀请私域社会成员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私域社会成员也要随礼。有财力的家庭会努力让宴会办得“风光”和“有面子”，其他成员在举办相同仪式时，也会相互参照消费标准。但这种礼仪消费的资源往往需要依靠平常的积累，这就进一步催生了二元消费伦理。

一方面，仪式性消费追求排场，甚至趋向奢侈；另一方面，日常消费则秉持节俭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仪式消费还演化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项目化消费，如建房或买房、子女教育等。这些项目化消费往往需要大量资源投入，因此人们既要长期节俭来积累存量资源，又要通过勤劳来获得增量资源。“勤”和“俭”都被赋予了伦理价值。在居民收入相对有限的条件下，项目化消费的标准却难以随意降低，因为它关联私域社会的身份和地位。

在当代，这种“勤”和“俭”的儒家经济伦理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像住房因关联面子与身份地位，无论价格高低，家庭都会倾向于购置，在自身能力不足时便会寻求家庭成员的资助。这导致私域社会成员的资源过度向项目化消费倾斜，如住房、子女教育、大病预防。另一方面，在日常消费中更多地遵循“俭”伦理。本应用于其他方面消费的资源被大量挤占，尤其是体验性消费。这种情形导致提供享乐体验产品的产业（即马戏部门）发展滞后。

① Dutta R., Levine D. K., Papageorge N. W., and Wu L., "Entertaining Mlthus: Bread, Circuses,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quiry*, vol.56, no.1, 2018, pp.358-380.

显然，马戏部门的发展是扩大消费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在传统儒家重视项目化消费的背景下，居民的预算结构无法为马戏消费（享乐消费）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这意味着生产端缺乏开发马戏技术和马戏产品的动力。其核心原因在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居民，对这类消费缺乏足够的动机和预算。此外，马戏部门的消费还受到时间资源的约束。基于儒家社会的“勤”伦理，企业往往实行延长工时的用工模式（如“996”）。相应地，私域社会成员的私人生活时间被挤压，缺乏足够的时间参与马戏消费；加之项目化消费已占据消费预算的大头，也没有过多的资源用于马戏消费。

新型合作治理：公私社会的结构性重组

如前所述，私域社会的发达也有积极的一面，它为居民提供了关系网络保护。随着青年一代的成长以及社会数字化趋势的演进，公域社会和私域社会的关系有望实现重构。而推动公域社会和私域社会结构重组的主要力量在于社会数字化和代际更替。

一方面，社会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公域事务的可见度以及人们为推动公域事务改进而发声的能力。伴随着 Web 2.0 的兴起，社交媒体快速发展，普通人更多地在互联网平台上进行内容创作、传播以及对各类网络事件进行讨论。借助数字与通信技术革命以及大众参与内容制作和传播，公域事务的视觉呈现既可以超越在地化的空间边界约束，以直观的方式出现在网民的智能手机屏幕上（这让它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发生在眼皮底下），又能超越传统体制化的传播偏好，让公域事务的数字呈现具备多维性。这种数字化的多维呈现，让公域事务摆脱了过去单向传播、大众被动接受的模式，形成了一个讨论的公共空间。同时，人们便捷地通过手机发声，逐渐提升了参与公域生活的能力感和主动性。久而久之，参与网上讨论成为众多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社会的数字化得以克服线下公域社会成长过于缓慢的局限，铺就了通往数字（线上）公域社会之路。尽管公共意见的数字化呈现未必都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但已然深刻改变了公共舆论生态，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策制定者体察民心民意的重要

渠道。随着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这种体察的精准度将进一步提升，网络民意还将在一定程度上反向影响和形塑宏观政策制定偏好。

另一方面，作为数字社会的“原住民”的青年一代，在提高参与公域社会的活动频率的同时，也倾向缩小私域社会的边界。这部分源于过往私域社会（如关系网络）的功能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而趋于弱化。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数字化平台经济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市场化交易从网络获取各类服务，并以这些市场化渠道获得的服务来替代以往私人关系网络成员所提供的服务（如照料卧病在床的家人）。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结构的改变，使得一些年轻人甚至作出“断亲”（脱离亲属关系圈）的选择。与此同时，大量的年轻人涌向城市或更大规模的城市寻找发展机会，脱离了原有的在地化关系网络，进入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亲属关系网络被压缩，取而代之的是一般性的朋友关系网络，私域社会也相应弱化。

而私域社会的弱化，将促使特殊道德的消解和普遍道德的兴起。普遍道德正是公域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随着政府愈发注重通过网络体察民意，一种新型的合作治理有望达成，尤其是数字公域社会中形成的共识，将有可能转化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回到消费领域，扩大内需和居民消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目标（扩大家庭部门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的实现，不仅依赖政府的政策，更依托公域社会的协同合作。只要公域社会更为充分地参与公共事务，只要居民的权利得到更大程度的提升和保障，生产与消费的内循环的阻隔终将被打破，居民消费也将在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校对 刘高翔